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我国近年开展了一系列跨国考古工作,与外国同行共同探索人类文明,分享中国考古人的知识与技术。与传统意义的考古不同,跨国考古不仅涉及考古工作本身,更是一项关系文明交往、文化遗产交流合作的事业。因此,如何理解跨国考古的意义,如何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下界定跨国考古的使命,显得尤为重要。王毅博士最新出版的《基于文明交往的跨国考古研究——以亚洲地区为例》关注上述问题,全面梳理了近代以来全球范围内跨国考古的历程,尤其针对我国百年来跨国考古的前世今生进行了反思与展望。

绪论和结语之外,全书分为两个主要部分。前一部分从宏观的视角,展现了跨国考古从西方主导的霸权与掠夺,到不断科学化、去殖民化的过程。同时,亚洲地区的诸多案例也表明,跨国考古逐步摆脱了文明优越性和技术局限性,成为树立国际形象、增进民心相通的桥梁。全书对这一转变的梳理全面且细致,通过生动的例证,既呈现出了欧洲中心主义考古的偏见、贪婪甚至血腥,也描绘了跨国考古不断“文明化”的进程。

本书后半部分则聚焦中国,以新中国的建立为时间节点,对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前半叶外国来华探险与考古做了系统整理,并对1949年后我国所开展的国际考古合作进行了综合评述。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中国在近代遭受了西方殖民者在文化领域的霸权与欺凌,考古便是其中代表性领域之一。国外考古“学者”骗取敦煌文书、盗掘石窟墓葬,并不是“跨国考古”,而是赤裸裸的强盗行径。另一方面,考古也成为民族觉醒的一面镜子,许多有志之士通过推动与国外考古学者的平等合作,维护国家主权,构建文化自觉。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走出国境,依托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践行着文明互鉴的理念,探索出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对外交流合作。

全书的结尾,作者对方兴未艾的中国跨国考古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实施建议,包括推动跨国考古人才培养、加强交往能力建设、提升理论研究,充实交往内容等等。这些建议既基于百余年来全球跨国考古的得失利弊,也根植于对中国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事业的冷静思考。比如在交往能力一节,不仅提出尊重对方国家文化传统的原则,并且通过文化人类学对时间感知力的理论,有针对性地解释了如何尊重和理解其他文化的行事风格。每一项思考和建议都有理论和案例支撑,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实操性。

全书的标题,以“基于文明交往”为导引,一语双关地探讨

## 读《基于文明交往的跨国考古研究——以亚洲地区为例》

燕海鸣

## 十年磨剑终成锋

皮道坚

2023年应邀出席良渚博物院主办的“不朽·大漆艺术五千年”展览开幕活动及座谈会期间,在会议材料上看到“推荐阅读”栏目内有:“聂菲、张曦,楚艺术全集·漆器卷,湖北美术出版社,2023年”的字样。回想2011年湖北美术出版社修订再版拙著《楚艺术史》时,我曾在再版后记中写道:“楚艺术既是楚学和上古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艺术史的重要篇章。遗憾的是拙著《楚艺术史》出版至今十六年,从艺术史学角度切入的楚文化研究仍属寥寥。”因此,得知这一信息时我的激动心情可想而知,立马通过友人联系聂菲女士。出我意料之外,不仅很快得到回复,而且不久便收到了聂菲女士给我寄来的《楚艺术全集·漆器卷》的样书。展卷阅读令我感到这正是我期待已久的“从艺术史学角度切入的楚文化研究”。作者用功甚勤,长期积累,厚积薄发才能取得如此成果,实在值得推荐。

聂菲女士长期在湖南博物院从事古代漆器研究工作。湖南及湖南省博物馆是中国古代漆器研究的重地,尤其是在楚汉漆器研究方面更是如此,因为那里有着极为丰富的楚汉漆器考古发现。为了探索楚汉漆器工艺与艺术风格,聂菲女士做了大量调研工作,曾到四川江油深山考察生漆采割,到厦门、荆州考察生漆精制,到福州考察脱胎漆器,到南京金箔厂考察金箔工艺,到成都、苏州、扬州漆器厂考察漆器工艺流程。为了解区域性漆器特点,先后到湖北、河南、安徽、四川、山东等地文博机构和考古工地调研与观摩古代漆器。这一系列考察活动,不仅加深了她的感性认知,而且对深入探讨和还原东周时期楚区域性漆工艺的流和和艺术风格大有裨益。在这一过程中,对两湖地区楚漆器考古发现资料的科学性、丰富性、完整性掌握,成为聂菲研究楚漆器艺术的得天独厚条件。她多年来一直把中国古代漆器研究,尤其是楚漆器研究作为其科研工作重点,十分关注楚漆器考古发现与研究中的学术进展,重视相关知识的积累,努力探索新的研究方法,通过“十年如一日”的艰辛刻苦研究,才能如此成功地完成其大作《楚艺术全集·漆器卷》。应该说这是她多年来从事楚漆器艺术与科学研究的丰硕成果,是我近年来看到的中国古代漆器艺术史与考古学研究方面很有学术特色的著作。

在中国古代漆器研究史中,楚漆器以其学术意义重要而著称。之所以如此,因为漆器制作工序繁复,造价高昂,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流行于楚国贵族阶层。当时漆器的应用范围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包,因此有人说楚的上层社会简直就是“一个漆器的社会”。从楚漆器上可以感受到一种很有生命力的文化精神,楚漆器以红黑色的强烈对比为基调敷陈五彩、深邃悠远、惊彩绝艳的色彩效果与艺术风格,源于楚人的远古图腾观念和祖先崇拜意识。老庄道家、屈子楚骚与楚地巫风的融汇孕育出楚漆器艺术诡谲通神的造型及其飞扬流动的图饰纹彩。早期漆器仿青铜礼器的特色,反映出先秦时期“礼”制的无所不在。而战国漆器逐渐突破青铜器造型及装饰风格的窠臼,大表出质地材料的深入了解与非凡技艺,成为楚人浪漫情怀和艺术风韵的载体,让人看到一种驱散历史阴霾之后的云蒸霞蔚气象。可以说楚漆器是中国悠悠七千年漆工艺史上的璀璨明珠,对楚漆器的研究是从历史的一个侧面探索东周转



了中文中“文明”这一概念的两层含义。一个是指宏观意义的群体的物质成就与精神内涵,即我们常说的文明交流互鉴的文明;另一个是人从蛮荒进步到现代的过程,比如日常生活中的“文明”礼貌。作者表示,本书关注的是前一种文明,即人类历史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如何通过跨国考古的方式得以呈现、阐发和共同保护。

不过,作为读者,我也从字里行间读出了作者对第二种文明的用心,尤其是在对西方中心主义考古学进行反思之后,全书的主旨便清晰起来:跨国考古所追求的,不只是古代物质与精神观念体系的证据,更是一种现代人以更加“文明”的心态与方式理解他者、认识自我的过程。书中借用哈贝马斯“主体间性”概念,强调考古学者在开展专业工作时,建立起自我与研究对象的平等主客间关系,切忌文化优越感,避免自我中心主义。这一提醒不仅适用于对欧洲中心主义考古学的反思,也同样提醒着中国的跨国考古工作,尊重专业规律,关注他国民众的观感,尤其不要一厢情愿、拔苗助长。在如火如荼的跨国考古时代,这种冷静的提醒可谓必要且及时。

从诞生的一刻起,中国考古学就被赋予了深刻的意义,比如国家复兴、民族存亡。在新时代,当我们跳出这些复杂情感,审视作为一门学科的考古,尤其是开展跨国考古工作时,应更纯粹地打开这一学科最本真的一面;我们探寻的过去,是关于人自身的生活和情感;我们要讲的故事,是超越国界的知识与体验。

王毅本科专业是外文学,硕士研究北朝胡人墓葬,本书的基础是他的博士论文。他亲身参与了很多申遗和文化遗产交流项目。他的求学和工作经历,正伴随着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和大国外交的蓬勃发展,这一独特经历也让他更深刻体会,大写文明的交往,靠的是小写的文明,是理解力,是同理心。这部著作是其20多年学术和实践经历的总结,很少学者能够比他更适合撰写这个题目。

毋庸置疑,跨国考古是文化遗产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但这种交流与合作的最高境界,应该是淡化国别和族群的标签,将交往对象视作真实的人,让所有的美好和魅力,通过真实的生活与情感传递和交融。正如本书所说,不要试图通过跨国考古去证明什么,一切自然而然,方显真正的“文明”。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基于文明交往的跨国考古研究——以亚洲地区为例》

作者:王毅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9月



型时期历史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途径。聂菲以楚漆器为研究对象,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科研工作。从楚漆器研究学术史上来说,无论就楚漆器本体的考古发现数量与品类之多、漆器图案之繁复而言,还是就楚漆器研究涉及学术领域之广博、创新突破之难度而言,都是相当艰巨的。聂菲迎着困难,积数十年之努力,“十年磨剑终成锋”,完成了《楚艺术全集·漆器卷》。捧读全书之后,我深感与同类或相近研究领域的有关著作相比较,该书自有其突出的优点。作者深入地综合运用考古学的区域类型学、艺术史领域的诸多相关研究方法,首先将楚漆器置于东周时期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在探索楚国历史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丧礼功能的深刻探讨中,从动态角度去审度楚漆器艺术创造过程中的各种意图与内涵,由此而获得了全新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其次尽可能广泛地汲取楚文化中心区域的重要考古资料、视觉艺术实例和文献信息,分类对器物进行分析与考证,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部全面论述楚漆器艺术的专著。

该书分上、下二篇。上篇“探索与研究”,主要从东周时期老庄道家美学、孔孟儒家美学以及楚国特有的屈子浪漫情怀等方面,梳理独具特色的楚漆器艺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例如“墓葬内外:楚漆器艺术的东周转型”,从大量考古资料中遴选出楚典型墓葬资料,从墓葬内外两个层面对所出漆器案例进行分析。一方面,对楚漆器的造型、色彩、纹样及工艺等方面进行分析,力图解析在百家争鸣的文化环境中,楚漆器如何在中华文脉的延续和发展中造就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探寻其风格变化和历史文化轨迹;另一方面,对楚墓内特定的空间配置与陈设方式、特殊的物质形式进行分析,探究楚漆器艺术与丧葬功能相关的创作意图和某种超越性的文化价值,以客观地认识楚墓中何以随葬众多漆器及其新型的丧礼功能。不难看出作者旨在通过对楚漆器艺术的制作、形制与组合、年代与分期以及区域特征等问题的分析,勾勒出楚漆器的总体发展脉络。

下篇“图解与考释”,着重选取典型楚墓出土的保存完好且形制差异明显的器物,以器形为主,从漆木器的形制特点、等级格局、丧葬礼俗和发展序列等方面来透视楚人的特质和情怀,以“瑶浆蜜勺”“礼乐征伐”“信巫好祀”三个部分展现楚漆器的艺术特点,考释其制作工艺、纹饰特点和文化内涵。许多器物配有高清图和出土情况照,还配有标识器物部位名称的线描图,作为重要辅助图解说明。全书图文并茂,学术性与可读性俱佳。

相信《楚艺术全集·漆器卷》的出版和发行,必将使更多人关注楚漆器的学术研究,也将为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史等学术领域拓展新的研究维度和视角。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楚艺术全集·漆器卷》

著:聂菲 张曦

出版社:湖北美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月

最近中西书局出版了葛承雍先生的新著《证史启今三千年——四十年史论文选》《书卷留声二万里——四十年书评文集》,单从书名上看,一本从时间概念上凝聚哲思,一本从空间理念上引人注目,实际上分别精选了作者四十年来的史论文章和书评文章。

自改革开放40多年来,作者参与、见证和记录了中国史学的转型嬗变与发展升华,曾经发表一系列能充分感受到那个岁月时代特征和鲜明特色的文章,兼具思想性、史学性、艺术性,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产生过很大的社会影响,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全文转载或介绍,得到学术界较高的评价。

作者秉持关切学术、服务社会的理念,节选的文章均全景式记述了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理论分析、思想交锋和学术对策,提供了一把人文情怀归结性的历史锁钥。作者善于打通文史哲互动的环节,发掘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除了在国家级纸媒上传递学者的声音,还在《历史研究》《中国学术》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不仅与社会大众分享学术钻研的精髓,而且还能使读者领略到不一样的学术品味。

古代先贤有言:“才须学也,学贵识也”,说的就是见识对于学的重要。当前一些图书存在有学无识的现象,通篇只是堆砌材料、转录史料,靠材料膨胀篇幅,用大段引文来注水,通过炫耀表面上的博学来掩饰思想的贫弱,被称为“电脑体”著述,这是一个亟需纠正的倾向。

笔者拜读过先生新著后,眼界大开,受益良多,心潮澎湃中写些读后收获。

《证史启今三千年》一书,将思想史论置于头章,并以“思想火花”引入全章,首先陈述了个人、国家与民族尊严的重要性,认为要有尊严地参与国际文化交流,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民族自信,要传承、创新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分别以清明感恩、文明化俗、遗产启蒙、精神标识等为题,阐述了文化遗产传承对当代思想启蒙与教育的重要意义。这里边有些文章是作者在国际论坛上发表的演讲稿,不仅论述中华文明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深刻地指出了中华文化遗产的历史形态与当代意义,列出了东西方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提倡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历史,从而对丝绸之路、世界和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如此以来,则对史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作者指出中国史学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和挑战,包括研究选题、重心、方法、成果评定、队伍等的转变,提出历史研究要有开放和交流的国际视野,要进行多学科、跨学科综合研究,要服务现代化建设。作者特别强调史学理论要拓宽视野,激活思维,更新突破,并阐明当代史学研究要服务于战略决策,要与社会生活相适应,要呼唤对民众新的启蒙。而思想启蒙又与社会史研究密切相关。作者认为中国社会史是以史为鉴的启蒙问题,是面向人民群众服务的一门普及学问,并结合语言社会史、地域特色、族群变迁,指出社会史研究就是通过对历代地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民俗民情等研究,为地区发展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提供历史借鉴,移风易俗,开拓民智。

需要注意的是,在历史研究中,史书是有局限的。作者指出对史籍要敢于怀疑,除了扎实的考证,更要有冲破传统的勇气,要脱俗求新,而文物、史学、文学的互动,则是当前人文社科创新发展的方向。作者首先研究历史思想,后又深入以文物为代表的文化遗产的研究中,阐释文物之美,揭示文化遗产的当代意义。文物作为图像史料,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可以直观形象地展示当时的社会风貌,补充文字史料的僵化与不足,作者提出的“左图右史”与“以图证史”互为补充,使文物图像与艺术历史互证,这种研究方法具有理论引领意义。文物之美,不仅存在于学术研究中,还应融入大众文化,惠及全体民众。从学术研究到展览艺术,如何将理论转化为实践为公众服务,如何促进文化软实力走出去参与竞争,如何促进中国与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也是作者一直关注的问题。中国的文化遗产无疑是一个巨大且丰富的宝藏,荟萃物质文明,给人以心智的启迪,作者结合大运河、古代建筑、遗址保护、出土文献、历史文化名城等文化遗产,从而说明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利用和宣传既要守住传统文化的根,保持其传统性、本土性和民族性,同时还要彰显其时代性、人文性和世界性,要与世界文化接壤,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

《书卷留声二万里》一书,作者首先紧扣当前学术热点“丝路胡风”,他高度评价蔡鸿生先生《广州海录》以人为本,避免了见物不见人的弊端,将海上丝绸之路做实、做深、做细。评《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充分运用最新出土资料,为粟特人华化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认识。他为《古丝绸之路上的文明印记》作序,强调了文物艺术展览的思想性,以丝路主题促进人类文明的交流。这些书评文章充满画面感,直击人的心灵。

在“从文物微观史到历史宏观史”篇章中,作者评自己老师的书籍《孙机中国古物》(仰观集)等,赞其以文献与文物互证,学术根基坚实,视野广博。为《长安新出墓志》《东方古都长安研究》《唐大明宫史料汇编》等书所作序言或书评,可以看出作者“以大观小,以小见大”的学术视野,致广大而尽精微,同时也彰显了作者“从物透人”“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与温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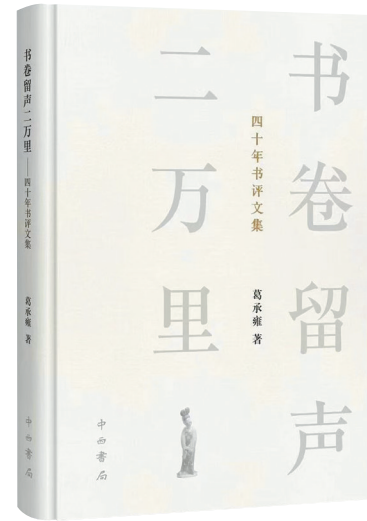
在“人文睿思下的遗产保护”篇章中,评《大遗址保护跟踪研究》既有宏观视野,也有典型案例,其“服务国家战略和人民大众”的理念已超出文物学术圈,传递给各行各业。评《文博谈》具有独立性、前瞻性、综合性、现实性、权威性,从思想到思想库建设,为增强综合国力作出了新的理论贡献。作者为长城保护价值、文物学编著、故宫学创立、元朝都城发掘等书所作序或书评,均涉及具体遗产的研究、保护,深入解析历史文化底蕴,但绝不只是聚焦于遗产本身,还强调了遗产保护与研究要融入民众生活,为社会服务,要与国家文化发展需求相适应。

在“超越考古再现的艺术之旅”篇章中,作者为《法门寺文物图饰》所作长篇序言,条分缕析,被誉为法门寺佛寺研究最得体的评论,既总结出了唐代皇家珍宝的艺术特点,又提出佛教融入中华文明的精华。他借《美源》一书说明学术界格外重视文化艺术资源,但都要回归公益事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社会文化需求。他考察陕北佳县民间壁画、府谷地方古迹的品评,则体现了作者对地方文化艺术传承发展给予的学术关怀。作者对唐乾陵陪葬墓石椁线刻画、

## 借古鉴今 走出象牙塔

《证史启今三千年》《书卷留声二万里》读后

申行舟



汉代碑拓等文物和艺术的品读,则凝练升华了考古文物中的艺术之美。

在“发掘被埋没的历史侧面”篇章中,针对专业颇深的《秦汉仕进制度》《中国审计史》等著作,指出历史研究要综合、多角度,要洞见社会发展变迁,经世致用,借古鉴今,为社会建设发挥作用。对《武则天本传》《纪功碑传》等书的评读,都强调了要密切关注人的思想和精神,从对政治、经济、文化的探讨到对个人本身的影响。

掩卷之后的共鸣之音,是作者对文化遗产长期思考后的肺腑之言,他提出应当有信仰和文化道德,恪守传承文化使命的责任,严肃态度,严格要求,严明规范,杜绝伪劣,摒弃庸品,注重质量,要以小见大增强文化实力,赢取海内外的认同,从而提高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力。

这两本书包含着从治学态度、视野、方法、思维,到价值与意义的一整套系统的方法论,凝聚了作者几十年来治学的精华和智慧,对我们求学、治学有着极大的指导意义。

首先是求学、治学的态度。作者在评孙机先生学术成就时,谈到先生《“明火”与“明烛”》一文为了文章的确凿证据而等待了三十年,最后依据朝鲜考古汉代墓葬中的题字解读谜案,令人肃然起敬。作者在谈到另一位恩师蔡鸿生先生的时候,评价为“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作者承二位先生之衣钵,数十年来躬身力行,孜孜不倦,年逾古稀,仍笔耕不辍,一器一物的考证都是一丝不苟。他常对同学们说,诸位先生前贤的这种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学术研究的榜样。

其次是学术视野,眼光决定高度,作者经常讲做学问要有世界眼光,研究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就是要说明开放与交流的重要性,这两本书中很多文章也都谈到了世界眼光。比如提出考古不能自我封闭,不能拒斥多层次的国际交流,必须坚持开放,通过交流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在谈到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时,指出以文化遗产促进世界先进文化交流互动,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不借鉴和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就很难得到发展,也不会形成巨大的竞争力,相反还会保守,故步自封甚至逐渐萎缩,要有大人类文明继承者的大胸怀,要有获得全球文化坐标的大意境。

再次是方法和思维。作者在谈及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变革时提到,应吸收和应用新的理论思想、新的科学技术,新的研究方法,从而丰富和创造新的史学方法论体系,促进跨学科、多层次的研究。除了方法的变革,创新思维也至关重要,是学术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作者在给研究生讲座时所作《学术境界与脱俗求新》中指出,学术要脱离戏说怪诞,只谈风月不谈历史的“俗”,要充满激情,敢于创新,鼓励要敢于求新,即使错了,但有板有眼,也是“错得可爱”,即使对了,但无思路,人云亦云,也是“对得平庸”。作者曾力排众议,首次系统梳理了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并正式提出大运河属于国保,为申遗奠定了理论基础,20年后的今天这种前瞻性得到业界肯定。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治学的意义。作者公开多次讲过,做学问一定要有现实意义,史学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认识现实,是探索历史发展道路和规律的主要手段,历史科学要积极参与到国家战略决策中,同样也需要“与时俱进”走出封闭的象牙塔。作者认为,当代实践的“活化”,就是提升国民与传统文化素养的共生互动,凝练出利于当代、造福人民的价值。

很多人研究历史文物,都是从知识到知识,从专业到专业,很少有人能够解读其背后的思想和精神,更是很少有人能像作者一样以历史去启迪当今社会的发展。当前很多专著和论文更多是在讲知识讲专业,而作者此书则是从专业出发但又超越专业知识本身的传道,启迪大众智慧。文化建设并非一人之功,而是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奋斗,我们当接过先生等前辈先贤的火种,让文明之火烧得更旺、更亮。

最后要感谢出版社编辑可能保留了作者四十年来的学术思考和写作轨迹,保留了讨论对话的现场感和争辩的“氛围”,让读者品到了这本学术“大著作”的原汁原味。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证史启今三千年——四十年史论文选》

作者:葛承雍

出版社:中西书局

出版时间:2024年1月

《书卷留声二万里——四十年书评文集》

作者:葛承雍

出版社:中西书局

出版时间:2024年1月